

比较高等教育

〔美〕菲利普·G·阿特巴赫 著

符娟明 陈树清 译

文化教育出版社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人民教育出版社印刷厂印装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3.5 字数80,000

1985年5月第1版 1986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

书号 7057·085 定价0.65元

目 录

序言	(1)
第一章 学科的产生：历史的、政治的和学科的观点	(4)
第一节 比较高等教育方面的早期著作	(8)
第二节 研究的发展趋势	(9)
第二章 国际性高等教育危机：原因和争论	(16)
第三章 大学的模式和办学制度的转移：哲学的、历史的和当代的观点	(23)
第一节 哲学方面	(24)
第二节 历史研究	(25)
第三节 现代大学的出现	(28)
第四节 美国成为高等教育的范例	(34)
第四章 比较高等教育探究的主要方面	(40)
第一节 高等教育的计划工作	(40)
第二节 教授职务	(46)
第三节 管理	(53)
第四节 大学和社会的关系	(57)
第五节 学生的行动主义	(63)
第六节 第三世界的高等教育	(76)
第五章 高等教育改革：七十年代的主要问题	(84)
第六章 今后的研究方向	(103)
结论	(107)

序 言

本书讨论了几个主要的问题。全书分为两部分：正文和文献目录。在正文部分里，论述了比较高等教育作为一门学科的产生和发展，这一部分还对高等教育有现实意义的课题为重点，介绍了这门学科的主要有争论的问题及其发展的动向。经过精心选择的文献目录，列出了人们认为对比较高等教育这一学科及对当前主要的争论问题都有重要意义的文献共一千一百部。编写比较高等教育这本书，现在还必定是探索性的，因为这门学科本身就是新的；迄今为止，几乎还没有人对这个学科进行过综合性研究并给它下过定义。此外，现在还没有人们确认的主要方法论，也几乎没有什么人们公认的权威，只有有限的、人们广泛使用的文献资料。然而，比较高等教育是近年来越来越引人注目的一门学科，它正处在把自己建成一个人们对它进行探究的课题的进程之中，它不仅与从事教育研究的学者们有关，而且也与必须应付中学后教育的现实问题和长远问题的决策者、政府官员及行政管理有关人员有关。本书的正文部分不但是为一般读者写的，因为作者力图使他们认清这门学科的发展方向；而且也是为决策者们写的，因为作者还力图对他们阅读有关中学后教育问题的文献提供指导。

这里，还需要对本书正文的结构做一些说明。这部分基本上是简明易懂的。第一节介绍了比较高等教育这一学科本身的产生过程和现有的杂志和科研机构等的某些主要情况。此外，还论述了本学科研究中有争论的某些方向问题，接下去便开始阐述比较

高等教育的实质性内容。对国际性的高等教育危机进行了分析和讨论，然后，论述了大学之间的国际联系，特别是国家之间教育机构模式在历史上相互学习与模仿的问题。正文用了最多的篇幅对比较高等教育的六个主要的研究课题进行了分析。最后一节论述了大学改革，这个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包括前边已讨论过的议题内容。因而，虽然正文的主要篇幅都是介绍本学科的基本文献，但这一部分对于论述学者们探讨的一个新领域的起源与发展方向，还是有广泛兴趣的。

本书是有许多局限性的。因为它是第一次试图对这个学科进行综合性研究，所以，它必然只能简略地引用大量的资料，而无须把所有资料都罗列上。此外，尽管作者力图引用法语、德语和西班牙语的有关出版资料，但对英语资料的介绍远比对其它语种资料的介绍要好得多。对于许多国家——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缺乏足够的文献资料，也使得本书在文献资料的介绍上带有片面性。由于篇幅的限制，写进本书正文和文献目录里的只是作者所找到的文献资料中的一小部分。我还引用了其它文献中的某些具体材料，其中有些篇目也列入了本书文献目录。尽管有这些局限性，作者还是希望本书能为人们研究和分析一个有生气的新学科领域在说明上迈出第一步。

我们讲的是“比较”高等教育，讲“比较”，我们的意思是说它涉及到一个以上国家的研究。但事实上，本书的正文以及随后的文献目录中的大部分材料，都只涉及到单个国家，只有很少一部分文献才真正具有比较的性质。因而，“比较”这个题目是 多少有些容易使人误解的。比较高等教育这个学科，从它的名称的严格意义上讲，形成还是缓慢的。造成缺乏具体比较材料的原因是复杂的。各国的研究重点和资金大都放在本国的问题上，而对外国的观点和意见则没有什么兴趣。在许多情况下，学者们都是跟着发起者们亦步亦趋。一般总认为国外的材料不适合于本国的具体问题。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是困难的，往往又是十分昂贵

的。学者们常常都回避从事以经验为根据的比较性工作，因为这既费钱，在方法论上也存在着问题。在有限的比较性文献当中，还有很多都是根据对二手材料的分析而写成的。由于有这样和那样的原因，比较高等教育的形成是缓慢的，大规模的研究计划在数量上仍然是微乎其微。

除了有进行比较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之外，还有不少定义上的问题。文献几乎是周而复始地提到高等教育、中学后教育、大学、学院、专科学院，近年来又提到义务后教育。在有些国家，上述名称中的某一个或某几个都是具有相当具体的涵义的，而用词不当则会引起混乱。例如，在美国，学院 (college) 通常是指对学生进行至多四年教学的中学后教育机构。而大学 (university) 一般都提供一个或几个学术领域的研究生教育。在英国，这些名称就有或多或少不同的涵义。在美国，研究生教育表明某种类型的学士学位后教育。而同样这种类型的教育在英国则叫做 post-graduate。在法国，学士学位则是学生在完成中等教育之后可以得到的资格证书。美国大学的首席行政官员通常称为 president (校长) 或 chancellor (校长)，而在英国和大多数英联邦国家，就把具有同样头衔的人称为 vice-chancellor (副校长)，在德国和不少东欧国家就称为 rector (校长)。各个国家大学教师的职称也各不相同，按照其头衔所授予的权力，各国也不尽相同。传统的欧洲大学教授有很大的权力，并且很有权威，他通常都是所在的系或讲座的主任。在美国，教授这一名称使用的范围要更广泛一些，因为在大学里，地位较高的教师的人数要比英国的多。象私人教师、高级讲师、副教授、讲师等学术职称在各国也都有，但这些职称在各国又都有特定的涵义。因而，根据不同国家和大学的具体情况而慎重地给这些名称下定义是十分重要的。虽然本书的正文广泛地涉及到大学及大多数中等后学校，但作者在本书中力图对其它各种名称给予明确的说明。

第一章 学科的产生：历史的、 政治的和学科的观点

比较高等教育是作为一种学术和政策研究领域而产生的，它正在打“基础”，而这种“基础”对一种专门研究来讲则是惯常的事情。现在在诸如这个领域能否变成一个正式的学科之类的问题上，人们仍然有某种争论。虽然不能担保，但比较高等教育正在发展成一个专业，这一点却是显而易见的。近年来，集中研究这一领域的某些杂志已经出刊了，各国也都有若干个出版商号把出版有关高等教育的书籍作为出版计划的重点。

负责研究本国高等教育的国家机构已经承认，采用比较的观点来认识高等教育是适宜的。例如，美国的卡内基高等教育委员会就出版了两本讨论有关外国问题的书籍。该会还委托外国学者撰写用他们自己观点对美国大学加以评价的文章。英国的罗宾斯委员会曾在一九六三年发表了很有影响的报告，这个报告中有很大篇幅是集中阐述联合王国之外各国的高等教育问题的。日本的教育规划人员对其它国家的教育发展深感兴趣，大批的介绍外国高等教育状况的书籍已被译成日文出版。在第三世界国家，有关高等教育的官方专门委员会一般也都最起码要吸收一名外国专家参加，而常常是吸收若干名外国专家参加。经济合作与开发组织对各国教育制度的评价，是由国际专家小组做出的。这种外来人员的参与扩大了许多研究与探讨的范围，但第三世界可能对欧洲的教育模式和政策强调得过了份了。官方专门教育委员会吸收外国专家参加的国家有印度、尼日利亚、加纳等国。另外，正象

本书正文将要说明的那样，在有关大学的观点和意见方面，已经进行了大量的交流和相互借鉴。学校模式也互相模仿，但各国所取得的成果并不一样。由某一国发起的特定的改革，也常常被其它国家所效法。

尽管人们对比较高等教育的重视是逐步加强的，但这种对大学研究兴趣的增加的主要原因，还是由于各个国家都面临着各自的特殊问题，因而，这种研究并不具有跨国的性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发展和这种发展给高等学校造成的极度紧张状态，已经引起了人们对于认识中等后教育和应付已经出现的各种问题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兴趣。大学已经演变成为它们所在社会的中心。大学对越来越多的人进行训练——并向他们授予各种资格证书。大学是重点的科研机构。几乎在所有的国家，大学的经费都已明显地增加了。因而，推动高等教育研究发展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人们对于回答相当实用的与政策有关的问题产生了特别的兴趣，而不是学术界的积极性。就已经开展的研究来讲，大部分也只局限于已开展研究的各国，研究人员在他们的研究方向上往往还是眼光狭窄的。大多数研究人员和决策者们认为，比较研究是深奥的，也是没有什么直接价值的。确实，简要地说明比较研究不但对高等教育提供了一种更为广泛的——从长远观点看又是有价值的——总的看法，而且也适合于某个国家所面临的实际问题，这正是本书正文的中心。

因为高等教育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仍旧是一个“国家的”事情，所以文献资料就很不平衡。情况似乎是这样：有关高等教育方面的著作当中，有一多半是美国人写的，并且主要涉及的是美国的问题。造成这种不平衡状态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美国的高等教育系统在世界上是最大的，而且这个庞大的系统又强调研究和学术著作的出版。美国高等教育的行政管理机构在世界上也是最庞大的，行政管理人员积极推动对有关大学的问题开展研究。高等教育作为一个学术专业，最早是在美国发展起来的，目前，

在美国有三十多所大学开设有关高等教育研究和培养行政管理人员方面的研究生课程。杂志、专业组织和会议网都已形成，用以为这个正在发展壮大着的专业领域服务。毋庸置疑，在原有大学里集中搞高等教育研究的系科与研究的存在，是激励研究、分析和出版的一个主要的因素。这些学术活动计划是在对受过高深教育的行政管理人员和集中开展研究这两种实际需要的刺激下制订并实施的。随着一种与高等教育有关的学术专业的出现，美国有许多社会科学工作者对中等后教育的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尽管这种突如其来的兴趣产生的原因十分复杂，但这肯定是与大学已在美国成为一种重要的社会机构这点有关，与大学面临着越来越突出的问题有关，与政府机关和基金会为高等教育研究提供的研究经费有关。

其它国家在出版有关高等教育的学术著作方面的情况斑驳不一。有少数国家，如联邦德国和英国，已制订研究计划并出版了学术著作或刊物。在联邦德国，大学校长会议等几个单位长期以来就对高等教育研究深感兴趣，并出版了若干种有关高等教育方面的杂志。柏林的马克思普朗克教育研究所也以进行高等教育研究为主。英国有好几种有关高等教育方面的杂志，其中包括综合性的《泰晤士高教副刊》(Times Higher Education Supplement)，该报所涉及的范围和它的质量，在全世界都是无以伦比的；也包括《大学季刊》(University Quarterly)，该刊最近已改成一般的理性杂志。学术研究的成果也反映在偶尔出版的《高等教育评论》(Higher Education Review)上和《高等教育研究》(Studies in Higher Education)与《高等教育公报》(Higher Education Bulletin)这两种新杂志上。《高等教育研究》由高等教育研究会主办，《高等教育公报》是由兰开斯特大学的义务后教育研究所主办。一种国际性杂志《高等教育》(Higher Education)是以发表大批有关英国高等教育的问题的文章为特色的。

大多数工业化国家,最起码都有一个研究中心或有一种杂志把主要兴趣放在高等教育上。把这些研究中心或杂志逐一列出,这就超出本书内容所涉及的范围了,但它们中间有一大部分往往对其它国家的教育发展并没有给予很多的注意。除了印度之外,第三世界国家尚未给高等教育的研究以很大的重视,很少开展有组织的研究活动,有关高等教育的出版物也历历可数。在这些国家确实开展的研究工作中,还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由来自工业化国家的学者们进行的,或者是由国际组织进行的。因而,尽管有关高等教育方面的资料的总量激增,但在文献资料上国与国之间仍然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对于许多国家来讲,甚至连基本的统计资料也得不到。

促使高等教育研究获得发展的主要刺激因素,是笼罩着整个中等后教育的各种“危机”,这可能就是事实。学者们的注意力已集中在有关高等教育的问题上了,资金也投放在研究上了。此外,高等教育作为一种专门和专业训练的领域,它的出现又刺激了研究的开展和著作的撰写。有史以来第一次出现了在高等教育研究上有“既得利益”的一批学者和研究人员。行政管理人員和其它与大学的经营有关的人员的数量也不断扩大,他们都是科研的服务对象。他们中间有许多人是政府各部的雇员,从传统的意义上讲,他们并不是学者,他们对于大学如何发挥作用的问题是关心的。由于情况往往是这样,即因为行政管理人員和从事研究所用知识的需要量不断增加,所以高等教育这个学术专业也要不断地发展,因而,研究人员的队伍也就不断地发展壮大。随着中学后教育在全世界从一种“尖子”制度变成“大众”制度,上述情况也将出现在至今尚未有专门研究队伍的国家之中。规模较大的大学系统几乎都不可避免地要求增加行政管理人員。一九七七年年中,由经济合作与开发组织创办的题名为《国际高等学校管理杂志》(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Management in Higher Education)就是对这种发展

趋势作出的一种引人注目的反映。此外，尽管投资的比例可能会随着对危机感觉的程度和可得的资金的数量而起落，但政府官员和大学的行政管理人员对于研究工作的要求以及向适当的研究投资的热情，也还会继续存在。

第一节 比较高等教育方面的早期著作

尽管比较高等教育方面的文献中有许多都是近年来出现的，尽管这个领域仅仅刚开始建立，但在若干国家，对于高等教育的研究还是有悠久传统的。有许多早期的著作都是描述性的，其目的是报导作者参观各种大学的情况或者要在作者本国逐步向人们灌输对于外国教育模式的兴趣。思温（C. F. Thwing）于一九一一年就在根据其旅行见闻而写成的一本书里，对欧洲大学作了描述。思温作为一个高等学校的行政管理人员，还对美国高等教育作过广泛的书面介绍。许多的早期著作注意宣传其它国家所进行的革新或注意使对革新抱怀疑态度的人们相信改变教育政策确实灵验。早期这类著作中，有一本是休伯（V. A. Huber）的《英国大学》（The English Universities），是一八四三年用德语出版的。十九世纪正是美国高等教育发生急剧变化的时期，在这个时期，有几位美国人令人信服地描述了在欧洲，特别是在德国，所进行的教育改革的情况。由于这些著作产生了一些效果，使美国的大学引进了一些德国的作法，其中包括研究生教育、强调科学研究和重视博士学位等。

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历史学家就跻身于最富有创造力和最优秀的高等教育分析家之列。黑斯廷斯·拉什多尔（Hastings Rashdall）的经典著作《中世纪的欧洲大学》（The Universities of Europe in the Middle Ages）一书，就为后人留下了对中世纪大学所作的经典性论述。罗伯特·雷特（Robert Rait）在他的著作中介绍了有关中世纪大学的情况。

约翰·塔特·拉宁(John Tate Lanning)介绍了讲西班牙语的美洲国家高等教育的历史。

在早期也象在当代一样，学术危机刺激了有关高等教育方面著作的涌现。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Abraham Flexner)有影响的著作之所以出现，其中部分原因就是受到了二十世纪充斥着美国大学的那些问题的刺激。他的著作是最早进行具体比较分析的专著之一，尽管他热情描述的德国大学在他的著作出版后仅仅几年就被纳粹政权的倒行逆施搞得面目全非了，但这本书已经成为这个领域的一本经典性文献了。马克思·韦伯(Max Weber)关于高等教育的著作，近来被爱德华·希尔斯(Edward Shils)收集在一起，成为一位著名的社会科学家关于学术危机的另一部评论文集。沃尔特·科奇尼格(Walter Kotschnig)编著的两本书，论述了本世纪三十年代的经济危机问题和衰退以及与此引起的混乱是如何影响学术界的问题。这两本书也从比较的角度出发，对高等教育进行了缜密的研究。弗雷德里克·李尔格(Frederick Lilge)，力图分析大学在纳粹德国的作用，写出了一部有关这个问题的有影响的著作。

第二节 研究的发展趋势

比较高等教育这个领域若没有刺激因素，它就不能“自然地”演化成一个学术研究领域。与自然科学中的某些分支领域不同，高等教育研究不可能是智力探讨的自然结果。尽管大学已经存在了一个很长的时期了，但人们对它进行分析研究，却仅仅是近年的事情。虽然在本书中不可能对高等教育这个研究领域的产生作出一种社会学的分析，但追溯一下这个领域的根源还是值得的。

如前所述，早期的著作中有一部分是“旅行家的见闻”，有一部分是对人们选定具体改革或革新的劝诫，还有一部分是在历

史方面学术研究的成果。著作的总量相当小，许多国家还几乎根本就没有。此外，尽管历史学家和二十世纪的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及某些新产生的学科的专家都广泛地论述过高等教育的问题，但是，一般说来，他们并没有把研究兴趣一直都放在高等教育上。对于少数不关心高等教育这个学术领域的发展的学者来讲，大学只不过是他们的一时兴趣罢了，这样说还是公道的。

尽管大学水平的师范学院在十九世纪末最起码在美国发展起来了，在二十世纪又获得了迅速的发展，但是，中学后教育也同样并没有受到专业教育家的重视。随着培训教师取得了专门职业的地位和先要求中小学教师接受高等教育、尔后又要求他们接受教学法方面的教育，这些新情况的出现，专业性的师范学院才建立起来。在美国，这些学校逐步取得了大学的地位。在某些欧洲国家，师范学院一直是单独设立，与原有大学相比，它们的社会地位往往是比较低的。随着师资训练越来越专门化和专业化，科研便日益发挥了重要作用。杂志创办起来了，教育也变成一种专业研究领域。然而，师范学院或师范学校还一直保持着与初等、中等教育的密切联系，实际上，对高等教育没有给以注意。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在美国，随着教育在社会上逐步取得重要地位并成为一种“大众”现象，它本身也变成一个专业领域。普通学校一旦承担了重要的培养训练和适应社会需要的任务，就要求教师们具有专业知识，并且对认识教育的性质发生了兴趣。同样，随着大学在现代技术社会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随着高等教育机构影响的人越来越多，对更深刻地认识高等教育和对中学后学校在经营上实现专业化的兴趣也就产生了。

除了缺乏高等教育研究的学术活动中心以外，学者们也不愿意对自己所在的学校进行研究。直至近年来，大学还被人们看作在社会上并不重要的机构，它们也没有引起社会科学家的广泛的兴趣。另外，人们可能认为，大学有些“超脱于”分析之外，似乎大学只有这样，才能专心于在知识上的追求似的。最后，大学

教师可能感到让人们对高等教育作社会分析以实现“非神秘化”这一点有某种不自在。由于这样或那样一些原因，对高等教育进行分析性研究的发展，还是缓慢的。

大学在现代社会中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这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高等教育研究的发展。例如，近来有一份报告表明，美国所进行的基础科学研究中，有一大半是由大学承担的。多数国家的大学入学人数激增，在短短的几十年之内便增加了一倍到两倍。诸如学生闹事之类的危机、对课程改革和承担义务的要求等因素，促使公众和政府把注意力集中在高等教育上。国家用于高等教育上的投资急剧增加的情况，也使得人们对大学是如何使用这些资金的问题产生了更加浓厚的兴趣。很明显，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高等教育研究的发展并不是由于对纯学术研究的兴趣，而是因为大学已经变成公众注意的核心目标了。正如我们在前面已指出的那样，既然从事高等教育研究可以得到资金，于是社会学家等学者们便都竞相为取得研究资金而努力。

尽管统计资料还没有，但情况还是十分清楚的：大部分由于得到资金而开展的高等教育研究是有政策目的，或者或多或少有些“实用”的性质，这就是说，在投资机构的心目中，研究对他们是有具体的用途的。尽管具体的研究项目有目的性，但是，有价值的资料却能使教育的争论问题得出公正的分析。政府建立的为达到应付入学人数的增加、认识影响高等教育的具体问题、解决学生为政治目的而采取的行动、规划全新的高等教育制度等目标而建立的专门委员会和开展的研究项目，不仅制订了计划、提供了与他们的研究欲达到的特定目标有关的信息，而且还经常搞出有关一系列争论问题的有价值的资料。在上述这类机构中，最大的可能当属美国卡内基高等教育委员会，该委员会由私人提供资金，它不但提出了一系列有关美国高等教育的政策建议，而且还出版了六十多本内容十分广泛的科学研究著作。该委员会的研究成果是有关美国高等教育资料的最丰富的源泉之一。该委员会

的活动并不十分强调比较，这就反映了只讨论本国国内教育问题的主要趋向。

政策研究具有某些重要性质，已经影响到高等教育研究领域性质的特点。研究课题通常都是由投资机构而不是由科研人员来确定的，而且，研究方法也由这些投资机构来作硬性规定的情况也屡有发生。这些投资机构所提出的研究课题是相当狭窄的，并且集中在满足具体的、往往又是眼前需要的问题上，而不是集中在有助于了解整个制度的主要问题上。参加研究的人员通常都是被别人逼着搞研究，不能随便超出那些特定问题的范围。研究课题上和研究方法上的框框——和由此而产生的研究成果——往往是与投资机构的设想和政策预测完全一致。研究人员，特别是高级研究人员，常常代表了他们国家在社会科学上的主要倾向，大型的对研究提供资助的机构和官方的专门委员会的头面人物很少受到批评指责。

在美国以及后来在其它国家，各个大学建立了研究机构来收集有关本校的资料，以便有助于学校进行行政管理和规划，同时也对学生服务提供帮助。这些研究机构在美国常常称作校内问题研究室，它们的研究重点和范围也很狭窄，很少开展那些可能被人们称为高等教育方面的“基础的”研究。通常来说，它们收集的诸如学生辍学率或大学行政管理上的财政情况之类的具体问题上的资料，它们常常在收集统计资料上有最拿手的本领。大学的研究机构所获得的研究成果，很少在已有的杂志上发表，想得到这种研究成果也往往很困难。尽管由校内问题研究室搞出的各类个案研究的材料可能对比较研究有价值，但其它国家要得到这种材料则是特别困难的。

美国的私人基金会和这类基金会组织十分活跃的少数几个国家已对高等教育研究产生了某种兴趣，并且也对比较性研究提供了一定数量的资金。可能在这个领域作出引人注目的努力的是纽约的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 (the 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该会不仅代表私人和国际机构开展某些研究, 而且还力图宣传比较高等教育的意义, 并出版了大批文献资料目录, 偶尔也出版一些学术论文。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的主要资金由福特基金会提供, 福特基金会允许该委员会开展某些计划外适应形势的活动, 但该委员会还依靠从各个组织获得的专项研究资金来完成它们所布置的诸如对发展中国家高等教育提供援助的评价之类的有指导的研究任务。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还主持召开若干比较高等教育问题的国际会议。但是, 现在该委员会已不能得到开展全面研究的资金了, 其研究也局限在某些重点项目上了。近年来, 耶鲁大学的社会和政策研究所 (Institution for Social and Policy Studies) 已开始进行比较高等教育的研究。

其它美国慈善基金会也对高等教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它们在援助国外大学方面所作的努力的结果。福特和洛克菲勒这两个基金会, 在支持研究和向大学, 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大学, 提供资助方面, 是最积极的, 他们还把一小部分资金投放到有关对高等教育加深理解的研究上。某些最令人感兴趣的研究包括对自己研究计划所作的评价, 这种材料并不公布, 学者们也得不到。尽管私人慈善机构要比政府机构有更大的自主权, 但它们的研究目的和资助计划也似乎与政府的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

国际机构也越来越对高等教育表示关切, 并且也制订了研究计划和方案。从事高等教育研究和出版工作的国际组织中包括: 联合国和它的专门机构 (特别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欧洲议会、世界银行、国际大学联合会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ies)、联邦书记处 (the Commonwealth Secretariat) 等。这些组织开展的研究, 在内容上千差万别。有些组织, 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持的国际教育规划研究所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Educational Planning), 它们的职责很明确, 集中搞研究和开展其它活动。其它有些组织, 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它的研究活动的范围往往就很宽。许多国际组织的出版物的内容十分丰富, 有些组织还主办杂志刊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展望》(Prospects) 和《国际社会科学杂志》(the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Journal), 发行的地区很广, 而且常常刊登有关高等教育方面的综合性文章。国际教育组织还是高等教育比较统计资料的主要源泉。在出版有关高等教育方面的材料上, 最活跃的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它们的总部都设在巴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成员只限于西欧、北美和日本这些工业化国家, 该组织开展内容十分广泛的高等教育研究, 并出版大批文献资料。它主持对其成员国的教育制度进行广泛的调查研究, 根据这些调查研究而写成的报告, 是以分析中等后教育为特征的。此外,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还主持开展对以下几个课题的研究: 高等教育改革(研究结果出版了若干种很好的文献), 短期大学, 教育规划以及高等教育中的经济问题等。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出版物有时反映的是单个国家的个案研究的成果, 但也经常包括比较性材料。它还出版若干本反映有关成员国高等教育发展趋势的统计材料。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开展的高等教育研究和活动种类繁多, 遍布世界各地。国际教育规划研究所已出版了许多有关中学后教育的研究文献。设在汉堡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研究所出版《国际教育评论》(the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ducation), 并开展一些研究工作。这些组织以及诸如欧洲议会之类的组织, 在保持高等教育方面的专家之间的联系、促进各国政府对高等教育研究更加关心等方面, 都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它们举办的讨论会、建立的规划小组、召开的会议, 为人们对教育问题进行比较性思考, 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刺激, 有时, 这种比较思考就导致了研究的开展和研究成果的出版。